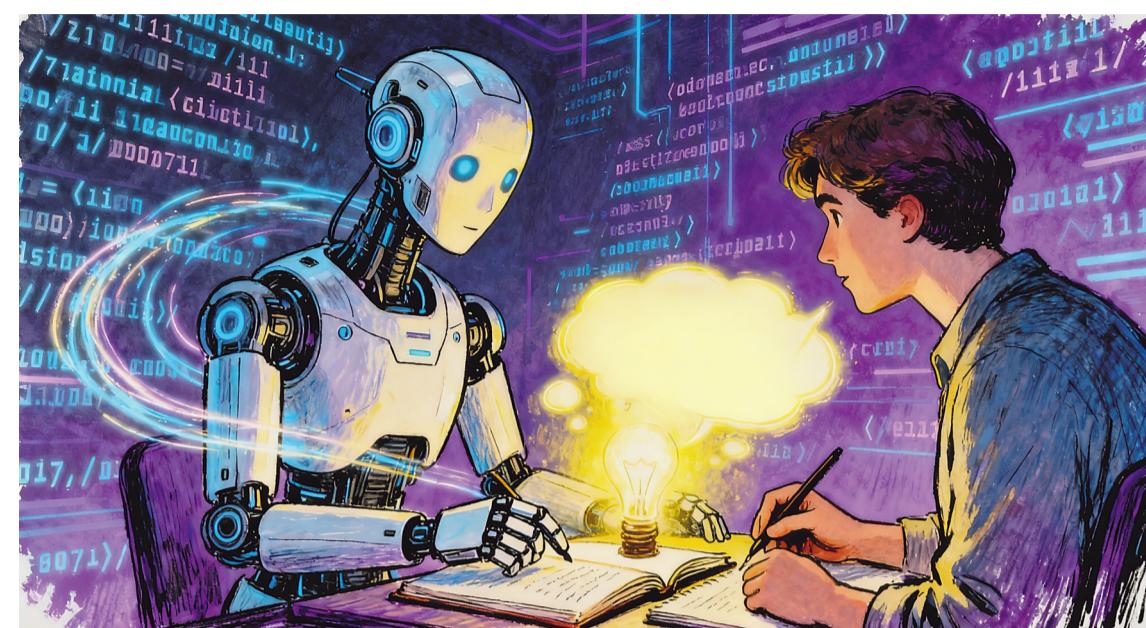


## 青视野

## 人类写作的“唯一性”无可替代

——AI写作“取代论”的价值谬误

蒋成浩



取代人类写作的集体焦虑。

二

AI写作能力的跃升,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层出不穷的文章见诸网络,相关主题的学术研讨也频繁召开。目前学界对AI写作的讨论,最为热烈的论题是“取代论”。所谓“取代论”,即探讨AI写作能否取代人类写作。研讨的结果往往认为,AI写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能够超越百分之九十的作家,但那百分之十的经典作家的存在,恰恰彰显着人类创作的不可替代性,表明AI写作依旧无法取代人类写作。类似的论调似乎都掉入了“自证陷阱”,而“自证”的逻辑背后,也彰显出话语的匮乏。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是“AI写作能否取代人类写作”,却疏于审视这一问题的真伪。“取代论”在认知上存在着明显的误区。一方面,我们从技术主义出发,得出的共识是AI技术将影响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随着AI技术的广泛运用,它必然会取代一些繁琐机械的人类工作。由此逻辑出发,承认AI写作的水平已超越大多数人类写作的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又从人的主体性的角度出发,论证人类精神创造的独一无二性,这种主体创造的精神动力,是AI无法达到的。由此可见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是AI写作无法企及的高度。因此得出AI写作无法取代人类写作的结论。

“取代论”的认识思维,还潜藏着“优胜劣汰”的思想。技术进步带来的主体价值恐慌被无限放大,进而以论证“AI尚不能取代的百分之十经典作家”来寻求人类写作的价值慰藉。其潜在的台词已然是承认百分之九十的作家将被取代,这正是漠视人类主体价值的丛林思维。“取代论”的观点是AI无法取代人类写作,论据是AI的水平能取代百分之九十的作家,但仍有一百一十位的创新性作家是AI无法取代的,因此AI不能完全取代人类写作。按照“取代论”的论证逻辑,我们不难推导出,随着AI技术的迭代,人类写作所据守的“百分之十”的领地,势必会越缩越小,直至完全被取代。之所以造成如此悖论,是因为“取代论”看似是在坚守人的主体性立场,实际上已悄然弃绝了人的主体价值的不可让渡性。

“取代论”的价值谬误在于,人类写作与AI写作之间并非“取代”的关系,而是不同维度的价值互补。人

作为有意识的生命体,其“价值”正在于能够凭借意识的能动性,通过实践创造自我价值。AI的类人化程度再高,哪怕是生成了自主意识,它与人类依旧是两个类属。两个类属之间,只能产生互相影响的强弱关系,而不能产生价值上的取代关系。这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海明威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一个人可以被打倒,但绝不能被打败。”对于AI写作而言,“打倒”可视为其在写作能力上高于多数作家的写作水平,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无法被打败”则是基于人作为意识生命体而得出的结论。AI生成的文本是AI呈现出的意义世界,人类写作哪怕在“文学性”上落后于AI写作,那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情感投射,其意义不能被任何事物所取代。一个小学生写下的稚嫩的诗,一对情侣给彼此写下的情书、一个孤独的个体写下的对生命的感受,这些包蕴着人类情感的作品,当然有文学水平的高低,但人类写作背后的价值的“唯一性”谁又能取而代之?

AI写作已具备较高的文学性,它已经产生数量庞大的文本,这是不争的事实。面对AI的文学生产,我们有必要调整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将之纳入到研究的视野。同样,在众声喧哗之中,更要澄清基本的常识。现阶段的AI写作与人类写作并不构成“取代关系”,对此产生的恐慌,以及背后的话语逻辑,反而走向了张扬人类主体价值初衷的反面。文学隐藏着人类心灵世界的秘密,它是人类意识的显现,就价值论层面而言,人类的文学写作不会被任何事物所取代。AI写作既取代不了“百分之十”的创造性作家,也取代不了“百分之九十”的写作者。强调人的个体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并非坚守人类中心主义,而是意在彰显AI写作与人类写作都在“文学性”的尺度观照下有着各自的价值。

“取代论”可以休矣!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生活状态。

在小说中,三位女性主角与父母的关系表现得最为突出。以程斐然为例,父母早年离婚,跟随母亲生活的程斐然与母亲矛盾不断,难有和平相处的时刻。无论是小说开头买香水骗母亲的戏剧性情节,还是诸如卖房子等事件引发的争吵对抗,都使得母女之间的关系像一场漫长的战争,充满了使人不安的火药味。然而周宏翔的笔触并未停留于此,他没有简单地将母女双方置于敌对位置,在二者之间竖起言语的高墙,而是给予其一个交流的缺口。小说中,程斐然与母亲隔空对话,楼上楼下通过电话吐露自己内心积攒已久的秘密,在近乎告解的自白后,母女获得了对彼此的谅解。

通过书写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周宏翔试图揭示这样一种真相,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而难以被概括的,纵使亦敌亦友,也绝不意味着这段关系的脆弱或疏淡。

在《当燃》中,我们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通过书写这些女性的不同境遇与精神世界,周宏翔试图将目光投向不被注意的“她们”,进而表现女性的生存环境与空间。在刘女士的自述中,自己因生下女儿而遭受婆婆的白眼与冷遇;钟盼扬辞职时颇为硬气地讲出“我做的时候,基本不走那条路,该有的业绩一样不会差”,其背后却隐藏着多少“女人做销售,容易吃亏”的生存经验。通过书写不同的女性命运,周宏翔试图告诉读者,当下不仅有充满力量与希望的、“自燃而燃”的新时代女性,在鲜有人关注的角落,还有时常被忽略的另一种遭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小说是想象力的艺术,写作者从生活的困惑出发,凭借想象力的翅膀凌空蹈虚——这种超拔构成了创作的不竭源泉。有作家曾区分了文学想象的两种表现方式:一种如《变形记》《百年孤独》,让想象直接飞升为作品本体;另一种如《卡门》《阿Q正传》,让想象深扎进现实的肌理。周于旸的小说显然属于前者。他的故事从现实升腾而起,试图走到生活的前面追求“不按常理出牌”的惊喜,那些超现实的元素彼此交织,构成了对读者期待视野与阅读情感的突袭。那些执拗于物理定律的灵魂,那些自愿退化为兽的人们,那些迷恋于天空不肯落地的少年,构成了其小说中奇幻而又不失真实的奇特景观。凡此种种,都来自写作者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所实现的张力,宛如磁悬浮列车的贴地飞行——在努力挣脱重力束缚的悬浮中,始终保持着与大地的微妙触碰。这种贴地飞行的想象力构成了周于旸创作中最重要的个人特质:在挣脱现实引力、凌空翱翔的渴望中,始终锚定人性深处与生活脉搏的沉重砝码。

《马孔多在下雨》《招摇过海》两部小说集相隔不到两年,题材并无太大变化,但在语言质地与问题开掘上呈现出清晰的飞跃。《招摇过海》延续了周于旸关注的“逃离”主题,主人公曾传裕偏执,不信邪、不服输,他“心里有股劲”,哪怕当渔民,“也想干点别人干不了的事”,即使曾经短暂屈服于命运,却始终无法遏制生命旁逸斜出的冲动。这是典型的“周于旸式”的主人公,他们是《马孔多在下雨》中将“毁掉人生”作为存在主义反抗的马登,是《云顶司机》中在百米塔吊上获得“令人健康的孤独”的吴伟廉,也是《鹦鹉螺》里数十年如一日、以肉身造就永动机的王悲喜……这些偏执的退化主义者、高空栖居者、永动机制造者,是被生活齿轮所擦伤却又拒绝沉默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因现实而逃离,但逃离的方式无一不是千奇百怪的超现实想象。

《招摇过海》的曾传裕将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推到了一个高点,而这也恰恰得益于小说在叙事和语言上惊人的成熟度。一方面,无论是有关“岛屿”的伏笔和首尾呼应,还是“我”这个旁观者外甥的人物设置,整个小说好似一个几经打磨的工艺品,呈现出一种千锤百炼后的准确与从容,其圆熟的叙事技巧好似一位金牌向导,引领读者沿着精心设计的路线,最终抵达写作者的心。另一方面,周于旸极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小说频频写海却每每不同,将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反抗命运的渔民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些“逃离”的故事还在以各种方式变形和延展。有一类作品属于“老题新解”,比如《退化论》讲述了一个放弃做人、自愿退化为动物的故事,这样的主题自然可以追溯到《变形记》,但周于旸的演绎却有独树一帜的气象。小说将主人公的退化场景设定在了动物园,当一个厌倦了人间生活的男人选择到动物园自我退化,并自觉将整个过程通过动物园所特有的观看功能来呈现时,小说便被赋予了层层叠叠的人与兽、“看”与“被看”结构:人如何从扮演动物衍变为成为动物?动物如何看待这个不速之客?作为游客的人又如何看待这个“类人”的动物或是“类动物”的人?这个中年男人最初渴望在动物园里找到逃离庸常生活的出口,然而随着日复一日的退化与错综复杂的凝视,他最终蜕变成了一个清醒的反凝视者。由此,小说引发读者展开对终极问题的思考:人究竟是在进化还是退化?周于旸精心设计了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故事,而不只是简单地拼贴当下的生活元素,从而使其在熟悉的主题上生长出了新的意味。

还有一类作品普遍融入了作者所痴迷的物理元素。在这些故事中,物之理与人之心相互纠葛,时间与空间彼此围困,它们从现实的土壤中生长而来,又以荒诞的形式回应、拷问这种现实。《命里有时》以“表停即人死”的情节设定来实现“机芯拟人心”的嵌套结构,随之引出背后的代际鸿沟与情感错位。《曲中人》将物理学家与小说家身份交叠,探讨“记忆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命题。《穿过一片玉米地》开篇以1961年刻于白桦树的普希金诗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营造出叙事圈套,但故事却沿着反方向徐徐展开——那个春雨之夜成了主人公永恒的时空奇点。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小说是其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总和,周于旸借由物理或科幻的元素实现了对个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风格化表达,现实与幻想难解难分,可解释的与不可捉摸的缠斗不休,最终构成了小说层峦叠嶂、暗藏机锋的鲜明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类作品在周于旸的创作序列中并不典型,技法也远不如“逃离”故事般圆熟,甚至还留有几分“练手”的痕迹,却能给人以“突袭”般的惊喜。《月亮照常升起》带有强烈的青春气息,那些滑梯连接的时空隧道、粒子与波的隐喻,都是少年心事的超现实显影。这个故事几经折叠变形,脱胎换骨为《雪泥鸿爪》,以“隐身术”的方式重新讲述时间与青春、死亡与爱欲的故事。小说看似在练习视点切换,实则在反复探讨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中的“在”与“不在”。那些有关时间的呓语伴随着少年的悔恨,迸发出巨大的冲击力。比如写困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少女:

“当我叹息的时候,我又开始怀疑,那一声小小的哀愁,到底是留在了时间的一秒格子里,还是落到了物理空间中,泛起一尺即逝的波纹。我就这样等待了许多年,像树一样坚韧,结出绝望的果实,一度无法确定自己的岁数。我的年轮藏在我自己的身体里,但我并不能把它数清楚。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盼望一个人归来,并不像告别那样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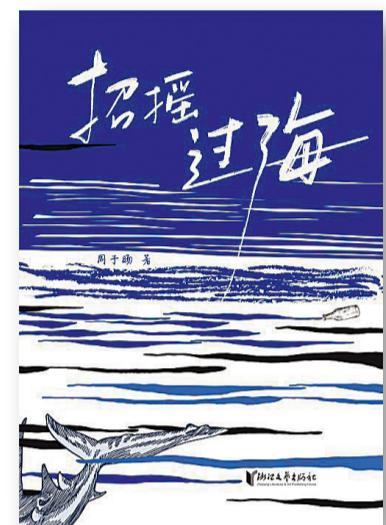
由此,通过窥探时间的秘密,周于旸写出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

青年写作者往往面临经验贫瘠与想象过剩的矛盾——他们的生命经验尚且有限,而想象力正是生机勃发。如何既不陷入现实主义的尘埃,也不沉迷于幻想主义的云端,这是初学者们的一大难题。在这一点上,周于旸早早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在贴地飞行的想象中锚定了个人风格。他让外星飞船坠落在玉米地,用铁轨枕木铺就时光逆行的隧道,他的想象力奋力挣脱现实地表,却又始终用人性的重力维系着与大地的牵连,那一点微妙的距离既是挣脱,也是依存。也许,最磅礴的想象,其根须恰恰深植于人性与现实的土壤,最自由的表达,其轨迹终需在经验的坐标中得以固定。周于旸的“贴地飞行”,是以奇诡的想象为翅膀,乘丈量人心之深与存在之重,这种以超现实的方式所达成的现实穿透力在未来还能如何被演绎出新,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论周于旸的小说创作

臧  
晴



《招摇过海》,周于旸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

## 青推荐

## 地方性书写的崭新尝试

——评周宏翔《当燃》

杨世全

近年来,从“新东北作家群”到“新南方写作”,小说中的地方性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诚然,“文学中的地方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论题,但当我们再一次把地方性提上讨论的桌面时,更多的问题与思考也随之而来:在信息传播交流迅速的当下,地方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特性?文学作品又该如何提取和表现地方特色?在某种程度上,周宏翔用《当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部小说的语言是其美学风格的直接体现,汪曾祺就提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当燃》中,周宏翔有意使用重庆方言,这使其成功构建了独特的叙事节奏。在小说开头的牌桌上,因一张牌而拉扯出的一系列对话,紧密相连而毫无缝隙。一位娘姨的发言可以一口气长达百余字之多,颇给人以“劈头盖脸”之感。这样的选择有效增大了小说的语言密度,使话语具有充沛的信息量,同时读来具有急促感,颇似重庆火锅的丰富与热辣。在人物的日常对话中,重庆方言词汇常有出现,对话的句式也被充分口语化处理,几乎是对日常生活对话的复现。这样的对话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小说的生活气息,使人物变得具体可感,消除文字与言语之间的隔阂,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近于听觉的体验,仿佛置身于重庆市井之间。

除小说的人物对话语言外,叙述语言同样重要。从周宏翔的自述中不难看出,他在语言的选取方面十分谨慎。虽然有意识地运用方言这一有力的支撑,但他并未滥用重庆方言,而是力求达到“用方言而非写方言”的效果。与紧密急促的对话语言相比,《当燃》的叙述语言可谓平稳舒缓。区别于口语化的对话,小说的叙述语言更近于书面语,仅时而掺杂几句俚语。对话与叙述语

言采用两种不同的节奏,前者紧凑急促,感性而饱含情绪,富有张力;后者则相对平缓,长短错落,简洁利落。两种节奏一快一慢,互相映衬,呈现出张弛有度的效果。

除了语言方面的自觉,周宏翔在故事与人物命运的安排上时刻表达着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如果说作为故事主人公的三位女性身上有最为突出的共同点,那么就是对重庆这座城市的热爱。小说的名字便来源于三人共同创办的本地品牌“当燃鸡”,这道富有重庆特色的菜式寄托着三人对人生的希望,更寄托着对重庆的文化与未来的希望。“当燃鸡”正是一次向外突破的象征,其“燃”起来的口号不仅是创业三姐妹对自己的激励,更是作者对家乡未来的期待。

与此同时,在对未来的期盼中,作者依然保留着一丝隐秘的乡愁。如程斐然与张深的对话就涉及重庆老建筑改建的问题。当张深感慨“老重庆不吸引人啊”时,程斐然回答道:“不是老重庆不吸引人,是现在的重庆总想用新东西吸引外地年轻人,但其实这些外地人来了就愿意探索老重庆。”这也是作者对文化的理解与态度。从对重庆本地文化的自信中,我们看到周宏翔对故乡发展前景的希冀,同时看到其对处在高速发展变化中的故乡的怀念与留恋。

无论在文学还是影视作品中,家庭都是绕不开的主题,似乎一切问题的根源最终都指向原生家庭关系或矛盾,而不可否认的是,家庭关系是最为错综复杂、难以从外部介入和表现的关系之一。从这一角度来说,周宏翔在小说中做的正是这种努力,通过描绘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生活图景,表现不同家庭状况中人物的

## “文学苏军”青年方阵

